



在创作道路上探索

关沫雨

远方文艺出版社

在创作道路上探索

关 沫 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敬文

装帧设计：张红凤

在创作道路上探索

Zai Chuangzuo DaoLushang Tansuo

关沫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714/16

字数 177,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10

统一书号：10360·39 定价：1.40元

目 录

战斗吧，文学.....	1
生活在召唤.....	7
他要我们振翅高飞.....	16
到四化建设的第一线去.....	20
谈文艺学习及其他.....	24
生活、写作与艺术.....	60
思想与艺术琐谈.....	75
怎样观察和认识生活.....	79
对生活要有新鲜的感觉.....	82
怎样取得写作材料.....	85
搜集写作材料要注意的事.....	91
怎样提炼创作素材.....	97
怎样选择和处理题材.....	102
谈作品的主题和它的提出与处理.....	112
文艺作品要着重写人物.....	118
关于情节的几个问题.....	123
结构和情节的关系及其任务.....	128
作品要讲求艺术结构.....	132
怎样进行作品的结构.....	140
谈短篇小说的写作.....	147
短篇小说怎样写得短.....	152

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157
文学语言要美·····	173
想象是作家珍贵的禀性·····	175
生活的真实和作家的职责·····	182
健康而准确地反映现实·····	187
以探索与劳动繁荣民族文学·····	190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学习同革命的浪漫主义 相结合·····	195
少数民族文学作者要加强学习·····	214
在探索中求提高·····	221
我怎样写抗联小说·····	226
关于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	232

战斗吧，文学

啊，文学！只有到今天，我们才能够想想你该繁荣了；也只有到今天，文学艺术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有人说文学是不流血的战场，但是在“四人帮”祸乱祖国的岁月里，文学这个战场进行着的不光是不流血的战争，有多少文艺战士洒满了他们的鲜血呵！从前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下了他的《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这些年也有多少同志在被“四人帮”的流放中，甚至是监禁迫害中写下了不寻常的篇章，他们的写作甚至比过去在国统区和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所受的限制还要严酷，这些都是血写的文学啊！“四人帮”的帮刊什么《朝霞》，“四人帮”支持的什么《虹南作战史》，连同他们的一切帮文学，和这种血的文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为一小撮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动派私利服务的帮文学，硬是污蔑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共和国，妄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老一辈革命战士，硬是闭起他们的狗眼不看现实，一味去写他们主观唯心世界中幻想的那一套。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一种所谓“文学”象这样污蔑、歪曲、造谣、欺骗过。回想一下我们可爱的中国文学吧，岂是这种卑鄙无耻的“阴谋文艺”所能打倒和代替的。

正象列宁所教养的十月的文学，是穿着红军大衣佩着刺刀出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文学也是在伟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它经受了幾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洗礼，和时代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人民宝贵的精神和意志，培养了千千万万人的革命理想 and 情操，起到了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精

神蒸气机，是旧社会的掘墓人、新社会的助产士的作用。伟大的先驱者鲁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战斗者，他的文学实践从那时就有着崇高的愿望和目的，他“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想“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他创造了阿Q、祥林嫂、吴妈、王胡等令人难忘的奴隶形象，对他们的饱受摧残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对他们的民族自卑自嘲精神胜利法，表示了极端的痛心。对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这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反动派，给予了严厉的鞭捶和打击！晚年的鲁迅，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永放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以他为首的中国这支优秀的文学队伍，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战斗过来的。远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象宗晖、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等人，就被敌人杀害了。抗日战争时期象名作家郁达夫、诗人蒲风，长篇小说《随粮代征》作者高泳，翻译家羊枣（杨潮），作家丘东平、陆蠡、叶紫、王鲁彦、万迪鹤、缪崇群以及其他很多人，不是在和敌人的战斗中战死病死，就是因贫病死于国统区的摧残。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我们的文学更在国内和国外闪耀着明亮的光芒，在“四人帮”血腥践踏的年月里，人民仍在偷偷地阅读它忆念它。“四人帮”有什么资格来否定这些光辉的业绩和战士呢！他们的污蔑和非议，不是象蜀犬吠日一样地渺小么！从前法国进步诗人艾吕雅为反对法西斯飞机轰炸西班牙内战时的人民，曾经写道：

“……可以习惯于一切，
惟独不能习惯于这些铅色的鸟，
惟独不能习惯于它们对光明的仇恨，
惟独不能习惯于对它们的让步。”

“四人帮”正是这种铅色的鸟，他们对光明的仇恨，人民是不能习惯的，也是不能让步的。不，岂止不能让步，应该象高尔基号召的那样：“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

“四人帮”污蔑说从《国际歌》到江青“培植”（应读为窃取）的样板戏之间，国际无产阶级文艺是一个大空白，真是没有比这更无耻地给自己添美的了。和中国的革命文艺同样战斗着的以十月革命文艺领先的国际进步文艺运动，也不是“四人帮”的狂吠能撼动一根毫毛的。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二月“给高尔基的信”里说过，在革命前“有‘计划的’合法的文学现在不可能建立”。但就在革命还没有胜利之前，不是就有了高尔基的《母亲》么，由于它及时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列宁给了很高的评价。高尔基用他的作品培养了人们的爱人生、爱自由、厌恶资本主义私有制、渴望幸福生活、相信真理必胜等宝贵的新品质，对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捷耶夫的创作是典型的十月的文学，毛主席说《毁灭》介绍到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富曼诺夫的战斗经历和他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也都有重大意义。《教育诗》出版后，曾使当时的苏联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黑与白》里狠狠地讽刺嘲笑了一个美国垄断资本家亨利·克莱，诗人死后十八年，这个资本家的儿子在四八年作了驻西德的美军头目，还下令烧掉他管区内全部诗人德文译本的诗集，可以想见诗作的力量！带着“向前”这个伟大字眼进入世界革命文学行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被称为“战斗中的领路人和第一个伙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优秀战士被称为“柯察金式人”。所以在列宁、斯大林时期，把一部成功作品的出现，比作军事上或经济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十月革命的文学，就是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贫乏和衰败中，从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中，从对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怀疑中，挽救了人类的艺术思想。在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爆

发危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威胁全世界时，十月的文学和十月后的建设成就一样，影响遍于全世界，促使各国出现了很多进步刊物和作家。他们中不少人在三六到三九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干涉的斗争中，参加到国际纵队中去，有的牺牲在西班牙。马德里之战曾促使多少国家的作家、诗人转变啊，就象后来斯大林格勒之战促使人成长一样。这样的文学，能象“四人帮”污蔑的那样“是个空白”么？曾经参加过国内战争，一九三四年逝世的十月革命的名诗人巴格里茨基，在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一个女少先队员的死》、《关于奥巴纳斯的歌》中，这样讴歌过青春：

“青春把我们引进
刀光闪闪的战场，
青春把我们抛在
喀朗施塔得的冰上。”

这样的作品至今还激动人心，使人想起十月内战时年轻革命者的勇敢顽强。在这种为新世界的诞生而斗争的文学面前，“四人帮”那种为个人私利而反对革命的帮文学，不是完全是个小丑么！

这种帮文学不但不能和中国的以及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比拟，它们就连和古典的以及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也是比拟不了的。本来古典的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它们只能揭露当时的社会，还发掘不出社会变革的规律和它的前景。但杜波洛留波夫已经意识到：“没有谁曾经注意过，文学究竟是否服务于哪些党派和服务于什么样的党派，文学究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别林斯基则说：“谁有才能，谁是真正的诗人，——谁就不能不属于人民”；属于人民的别林斯基只是早死，才使他免于坐牢。被誉为“俄

罗斯文学的太阳”的普希金，是把文学当作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的，他也就因此和莱蒙托夫先后死于凶徒之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他和杜斯妥耶夫斯基相继被判处长期徭役。受人爱戴的诗人茹科夫斯基，在拿破仑进攻俄国时参加了志愿军；写喜剧《聪明误》的格利包耶陀夫，也同样投笔从戎。契诃夫是把文学当作生活的第一和主要事业的，他的小说《第六病室》才那样激动少年时代的列宁。信仰基督的托尔斯泰，由于批判了黑暗的沙皇俄国，被最高宗教会议破口大骂；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出走，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其他被判死刑、拘禁和放逐、逃亡的俄国作家是无其数的。

西欧作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的哈代当他用他的《苔丝》、《无名的裘德》揭露和控诉资本主义罪恶时，人民就称赞他，当他在压力下逃避现实而去写“超然”的诗歌时，他也就失去了光采。法国既是军人又是音乐家的罗日·李士耳，由于革命激情，一夜之间写下了后来脍炙人口成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马赛革命军在法国大革命时就是唱着这支歌曲直抵巴黎的。令人激动的雨果，在路易·波拿巴实行王政复辟时逃亡布鲁塞尔，转居英海峡群岛，从此流亡在外二十多年。他说：“假使有十个法国人留在放逐中，我就留着和他们一起；假使是三个，他们之中有我在内；假使只留一个，那末我就是这个流亡者。除非是自由法国，我永不回转。”他六十八岁时遇上德军侵法，他报名参加了国家近卫军，把著作收入捐给了国防，买了两尊命名为“雨果”和“沙巴坚”的大炮。他警告侵略者说：“你们攻占了要塞，你们面前还有城墙；你们攻占巴黎城墙，在你们面前还有街垒；你们攻占了街垒，那时谁知道，爱国心在悲痛中会提示一个民族干出什么来？污水管将要敷设地雷，整条街道将要炸得满天飞，你们将注定遭到某种可怕的东西：占领巴黎要遇到寸土必争，步步为营！”由于

从来历史上的进步文学和作家都是同人民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才说拜伦三十六岁死掉是幸福的，他再活一些时将成为反动的布尔乔亚；人们哀痛雪莱二十九岁死掉，因为他从骨髓里都是革命家。

啊，文学啊！一切进步的 and 革命的文学，所以令人激动，就因为它和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总是为人民的命运而战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多人不相信政府的统计和宣传，却相信作家。但文学在中国却从来没有象“四人帮”的帮文学这样信誉扫地，这样受人诅咒唾弃，这样低调反动，这样鄙俗短命，被历史打上可耻的烙印。现在终于迎来了文学艺术真正的春天，被摧残迫害的文艺同志，新老革命文艺战士，我们要更好地深入生活，从工农兵汲取力量；更好地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提高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努力学习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艺术技巧。在为我国新时期总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革命和人民而斗争中，我们应该战斗得更好，更出色，更有水平，更有力量！

生活在召唤

从事文学创作，最怕的是与生活隔绝，与群众隔绝，那就会陷于创作素材涸竭，去描写身边琐事，表现自我，或是去完全进行空想。有些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朋友，常喜欢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譬如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啦，战争啦，或是其他等等。情形有点象外国的某些青年作家，一开始专爱写火星上或者金星上的事。有人开玩笑说：“什么时候他们回到地面上来，什么时候他们也许会写得好一些。”这说的是完全空想的坏处。实际上作家的创作，仍然是社会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正象人说的生活阅历好比是火药和子弹，要想射击就得有它。古人说的“师造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要向生活学习。生活的修养是最根本的修养，不管你艺术才能多么高，没有生活还是写不出艺术品。就是音乐家也需要认识生活，不能只从音响世界去追求灵感。

给人感染深的常是些自传体的作品，这是由于作者写的多是亲身经历。艾芜早年的《南行记》，幼年给我印象很强烈。作者在三十年代曾从昆明到缅甸，从仰光到新加坡流浪过，这段独有的生活经历，在他写来很亲切感人。《青春之歌》写得成功，也因为作者在北京读过书，参加过救亡活动，抗战时又有过县妇救会主任的生活经历。周立波在黑龙江参加过土改，写了《暴风骤雨》；后来去石景山钢铁厂，写了《铁水奔流》；回湖南家乡生活，写了

《山乡巨变》，都是他各时期生活的结果。外国作家的情形也是如此。巴尔扎克开始时是个律师，梅里美是个考古学家，高尔基流浪过大半个俄罗斯。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影子。司汤达的每部小说都有亲身体验，他写《红与黑》用了不到六个月时间；可是在那以前他生活了四十六年，他把他的许多思想、感情和观察都写进了作品中。对这些杰出的作家来说，过去的岁月正是以后创作的储备。果戈理在闹市的茶桌上能写上一两章《死魂灵》，高尔基、契诃夫曾用几个小时写就他们的某些短篇，无不是由于有生活的积累。所以契诃夫说：“如果我是医生，那么我就得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那么我就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住在小德米特洛夫卡街……。”有多少生活才可能有多少作品，不是订多少创作计划就能写多少的。要说文艺创作有规律，受生活制约这就是它的规律之一。

为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了提高观察生活，捕捉个性特征和表现的能力，我们必须认真地深入生活。我们应该集涓滴而为江河，汇百川以成大海，把我们日常对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体会积累起来，好把它用在我们未来的创作中。

二

年岁很轻，想从事文学创作，就不要怕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哪怕它是很艰苦的。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对一个作者一生的创作很重要。作家不是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也不是想写谁就可以写谁的。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环境的描绘，无不受作者生活经验与阅历的限制，总是体验过的事物容易写得成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原始人的为什么画动物多，画植物少，因为那时过的是狩猎

生活。中国从元明清以来，诗文多出自士大夫手，戏剧和小说则多出于社会地位较低微的文人，因为他们更接近引车卖浆者流。诗人和作家常常是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当杜甫还是一个富豪子弟、过着“裘马颇轻狂”的快意生活时，他写的《忆昔》诗，把开元时期写成兴隆的“盛世”。同一时期的高适，则在他的《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和《东平路中遇大水》等诗中，写了很多开元时的民间疾苦。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和王维都在长安一带居住，由于杜甫接近人民生活，写的是《兵车行》、《丽人行》、《羌村》和《北征》，以深刻的批判精神揭露着统治阶级的罪恶。王维生活闲适隐逸，对现实感触不多，诗作多寄情于山水，陶醉于自然。后来杜甫脱离生活，不仅作品少，也带着很多的廊庙气味。到他再离开长安宫廷生活，到华州又接近人民，才又写了为人传诵的《三吏》、《三别》。李白游安徽泾县桃花潭，农民汪伦酿美酒相待，使他写了《赠汪伦》。这是与人民交往，有深厚感情之作，是李白诗中少有的作品。北宋初年，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柔弱无力，柳永一生飘泊，词作多写羁旅行役之苦。范仲淹却在《渔家傲》中写道：“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写出了边关的气氛，战地的豪情。这是由于范仲淹领兵抵御过西夏，有边陲战斗生活的缘故。

写《城与年》和《初欢》的费定说：“广义地说，很少有一部小说不是自传体的。”法捷耶夫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一直在远东游击队，他说：“在整整的三年中，我和他们一道走过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和他们同盖着一件大衣睡觉，共用着一个士兵饭盒吃饭。”他才写了长篇小说《毁灭》。鲁迅不熟悉工人，因此写了阿Q，并不是说辛亥革命时只有阿Q。鲁迅后来曾想写反映红军长征的作品，也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生活而作罢。他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

能到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写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也由于生活的原因，谢冰心早期的作品多是母爱、大海、童年的欢乐。沙汀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写的小说，气氛沉郁，而少正面形象，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与生活条件有关。

年老体弱的作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到生活中去，年轻的作者更应该发奋立志，深入四化建设的各种生活。过去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很多是工农劳动群众。今天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主要要依靠的还是他们。接近他们，永远是头等重要的事。何况瑰丽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很多更是要靠年轻的作家们来描绘的。

三

创作劳动好比蜂酿蜜，体验生活有个点，也就是说深入些，作品容易写得真实细微；同时也需要洞观全局跑跑面，作品才能写得丰满开阔。所以，绝不应仅仅满足于狭小的生活圈子。听说有些国家的作家有这种情形，就是把闭门读书，听广播看电视，跑作家协会和编辑出版单位，或是找同行聊聊天，甚至看影剧和休息娱乐，都当成是作家的主要生活。他们忘记了历史上那些优秀作家是怎么做的。就拿契诃夫来说吧，他不仅在塔干罗格、莫斯科及其近郊、彼得堡、梅里霍沃和雅尔塔居住过，还旅行访问过克里米亚、高加索和整个乌克兰。他的城市生活使他熟悉贵族、地主、军官和上层知识分子。他的医生职业和乡村生活，使他接触了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到库页岛去的三个月，他访问了所有的村庄和岛上居民。他的才能很得益于他的视野的广阔。我们的古人司马迁、杜甫都行过万里路，进行过广泛的观察。李白说他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一生漫游名山大

川，放情四海风光，在旅店、渡口、船头、马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他的诗风才那样豪迈开阔，富有浪漫气息。罗贯中、施耐庵写《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除了吸收前代遗产，也由于农民起义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经验。作家杨朔不仅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还深入朝鲜前线，才写了著名的《三千里江山》。农村题材作家高晓声认为：“生活面越狭窄，越不容易深入，越扩大视野，越易潜入深度。”他有些农村素材，是由于进城后对生活有了比较和分析，才形成小说的。所以当作家最怕关起门来六亲不认，只局限在自己狭窄的生活天地里。

高尔基在三十年代就反对作家只生活在作家的圈子里，他说：“如果让两三百个文学工作者都住在一条街上”，那么，“我很怀疑文学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他认为“作家之城”等于是的一所修道院，是为了增加作家的罪孽才建立起来的。这罪孽就是和生活隔绝。

生活视野不广阔，只能使人在狭隘的角落里沉思叹惜，难于抒写时代的风云。生活在召唤，我们还是应该象斯大林劝诗人杰·别德内依到巴库油田去看看那样，学习高尔基具有更广阔的生活视野，才会把作品写得瑰丽多彩。

四

用画表现词句“踏花归去马蹄香”，难的是怎么能让人知道“马蹄香”。画家让蝴蝶跟着马蹄飞，也就香了；用画表现诗句“竹锁桥边卖酒家”，酒家被竹林锁掩了，画上不能见，却又须让人知道确有，在竹林深处画个带酒字的酒帘，酒家也就有了。这都靠的是熟悉生活。

从前王冕挥毫须臾画就牛斗图，牧童很惊讶，戴嵩成为大画家后，画牛斗时竟让老牛尾巴朝天，遭到牧童讥笑，都由于对生活的熟和不熟。

雨果在英海峡杰西岛和盖拿西岛流亡二十年，非常熟悉岛民生活，写了小说《海上劳工》。

契诃夫住在梅里霍沃时，担任了繁重的社会工作，是地方自治议员、学校的创办者和督学、扑灭霍乱的医生，要给人治病，又要到处跑，因此在文学上他有无数素材可写。

中国作家是抗战后最和人民接近，刘知侠在那时和铁道游击队有联系，常来往，后来写了《铁道游击队》。刘白羽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时又以记者身份随四野解放东北、平津，进军江南，并两次赴朝，写了《无敌三勇士》、《为祖国而战》和《政治委员》。曲波十五岁参加八路军，以后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写了《林海雪原》、《山呼海啸》。孙犁曾在白洋淀教书，抗战时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写了《白洋淀记事》。都是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丰收。

今天在“四化”建设中，人民在成长，全国在跃进，我们如果脱离这个过程，又不研究它，就写不出充分反映现实的作品。

作家熟悉生活首要的是熟悉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和熟悉人三者结合起来，抓住了两个人：作家和艺术创作对象。重视这两个人，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解决了创作上的主要问题。古谚说：“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知人难，作家却又必须知人。

茅盾在他的《选集自序》中说：“子夜的写作过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我们生长在旧社会中，故凭观察亦就可以描写旧社会人物，但要描写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则首先你必须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否则，不论你的‘第二手’材料如何多而且好，你还不能写